

# Anthologization and Canon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A Case Study of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thologized by Stephen Owen

XIA Wanlu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Received: October 22, 2023

Accepted: October 3, 2023

Published: December 31, 2023

**To cite this article:** XIA Wanlu. (2023). Anthologization and Canoniz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A Case Study of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thologized by Stephen Owen.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3(4), 085–092, DOI: [10.53789/j.1653-0465.2023.0304.010](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4.010)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3.0304.010>

**Abstract:** Anthologization is one important way for non-Western counter canons accepted by the world literature system. This paper examined the standards and strategies adopted by Stephen Owen in anthologizing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the strategies adopted by Stephen Owen manifested his preference for human-oriented themes, which are beneficial for knowing the aesthetic expect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by the world literature system dominated by Western literature and beneficial for the effectiv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Keywords:** Stephen Owen;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ture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XIA Wanlu holds a doctorate degree in Translation Studies. She is currently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t Sichuan University, China. Her research scope covers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and philosophical classics.

# 文選編譯與中國文學在英語世界的「經典化」

## ——以宇文所安編譯《諾頓中國文選》為例

夏婉璐

四川大學

**摘要：**文選編譯是非西方作品成為「反經典」進入世界文學體系中心的重要途徑之一。本文考察了宇文所安編選《諾頓中國文選》的標準和策略。本文發現，宇文所安在《諾頓中國文選》中的編選策略和標準體現了他對普遍人性、對人的普遍情感以及對存在與死亡等與「人」有關的命題的關注。這一發現有利於分析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文學體系對中國文學的審美期待，有利於實現中國文學的有效國際傳播。

**關鍵詞：**宇文所安；《諾頓中國文選》；中國文學外譯

### 引言

達姆羅什將世界文學體系中的文學經典劃分為三個層次：超經典(hyper canon)、反經典(counter canon)和影子經典(shadow canon)。「超經典」是指那些在世界文學體系中一直保持重要地位的作家作品，即「大作家」作品。「超經典」大多來自西方世界。「反經典」主要是指非主流的作家作品。這些作家往往使用非主流的語言進行創作，或者雖然他們使用的是主流語言，但作品仍然屬於非主流的文學傳統。「影子經典」是指那些曾經進入中心的「小作家」作品。隨著時代的改變它們漸漸被遺忘，退到「超經典」的陰影裡。(達姆羅什，2013:161-162)達姆羅什認為，包括中國文學在內的東方文學作品在當下的世界文學體系中的角色大多是「反經典」。雖然它們在西方無法撼動「超經典」的地位，但也許會在某個階段部分地進入體系的中心。(達姆羅什，2013:162)

當下的世界文學體系是「一個不平等」的體系。(Moretti, 2000: 66)西方文學在這一體系中佔據主導地位。「反經典」如果想要進入中心獲得認同，就必須獲得具有話語權的西方文學的認同。文選編譯是非西方作品成為「反經典」進入世界文學體系中心的重要途徑之一。勒菲弗爾指出了文選編譯在構建異國文學形象中的重要作用：「在同一歷史時期，翻譯家、批評家、歷史學家和選集編撰者都在相似的制約之下重寫文本。他們是形象的構建者，在客觀中立的面具下發揮著顛覆性的力量。(Lefevere, 2006: 6-7)

在西方學界，宇文所安所編譯的《諾頓中國文選》是一部權威性極高的中國古典文學作品選集，成功實現了中國古代文學在異域的經典化。弗蘭克指出：「一部選集代表了一個從更大的語料庫(所有有可能相關的語料庫)選擇出的次語料庫，而這個次語料庫與更大的語料庫之間是一種提喻的關係。這種關係的準確性質，即哪些部分被選取出來代表整體，是十分有趣的研究物件。」(Baker, 2004: 14)因此，對宇文所安在

《諾頓中國文選》中的編選策略進行研究可為中國文學在英語世界的經典化提供可資借鑒的歷史經驗和現實參考。本文主要關注以下問題：1. 宇文所安編選《諾頓中國文選》的標準和策略是怎樣的？2. 宇文所安的編選策略對實現中國文學作品在西方的「經典化」有何啟示？

## 一、何為經典？

章太炎指出：「經者，編絲連綴之稱，猶印度梵語之稱『修多羅』也。」（張隆溪，2005：179）「經」本指將連綴書簡的絲帶，中國古代用絲將竹簡連接起來。佛教的經書也是用絲將貝葉連接而成，稱為「修多羅」。後用「經」代指書卷。《說文解字》指出：「典，五帝之書也。……莊都說：典，大冊也。」「典」本是記錄帝王言行的史書，由於在形制上大於一般的書，故有人稱之為「大冊」。後來「典」發展出「常規」「常法」的含義，如「典，常也。」（《爾雅·釋詁》）「典」也就具體專指傳播常道、法則及規範的書籍，這些書籍可作為典範，如「掌建邦之六典」（《周禮·天官》），「有典有則」（《書·五子之歌》），「典，謂經藉」（《孔傳》），「伯喈曠世遺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後漢書》）

因此，在漢語中「經」與「典」二字含義頗為接近。「經典」一詞在現代漢語中也就指「傳統的具有權威性的著作」，（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詞典編輯室，1986：598）或「一定的時代、一定的階級認為最重要的、有指導作用的著作」。（辭海編輯委員會，1979：1163）

英文中的經典有 classic, sutra 和 cannon 三個詞。Classic 源於拉丁文的 classicus, 是古羅馬稅務官用來區別稅收等級的一個術語，意為「屬於一個等級或部門」。文藝復興時期開始人們將此詞用來區分作家的等級，並將其引申出「傑出的」、「標準的」、「古代的」等意思。古希臘羅馬作家被尊為 classical authors。文藝復興之後興起的「古典主義」（classicism）以崇尚和效仿古希臘羅馬文化而得名。在這一時期，classic 除保持「古代的」這一傳統含義，也發展出「獲得認同及價值確立的藝術作品」的意思。（Pearsall, 2001：338）這兩重含義已與今日「經典」一詞的含義一致。因此，「經典」具有兩重維度，一是時間之維，二是價值之維。

Sutra 一詞源於梵語，原意為「思路」、「規則」（Pearsall, 2001：1870），後專指宗教文本，如西元前 500 年至西元前 200 年間的印度教教義集和佛教經文。Canon 一詞源於古希臘語，原意為「蘆葦」或「棍子」，後逐漸發展出度量工具的意思，引申出「規則」等意思。在中古英語中，canon 指聖經或與聖經相關的正統的宗教文本，後由此引申出「教規」的含義，繼而發展出「評判某種東西綜合的律法、規則、原則或標準」之意。18 世紀以後，canon 一詞的詞意逐漸超越了宗教的範圍，延伸到文化領域。這一時期，canon 發展出了「某一作家或藝術家作品」和「被永恆確立為具有高品質的文學作品」的意思。這一意義已接近今日「經典」一詞的含義。在文學批評領域，這個詞指：「憑藉自身的特質及內在價值從而優於其他文學作品的作品。」（Hawthorn, 1994：27）

概而言之，文學經典主要具有以下兩方面的特點：

（一）文學經典是經某一時代權威機構遴選出的文學作品。「所有經典都由一組知名的文本構成——一些在一個機構或者一群有影響的個人支援下而選出的文本。……這些文本被認為是有價值的並被應用於教育，它們還一起構成文學批評的參考框架。」（佛馬克，2007：18）

（二）文學經典在文學領域具有典範作用。文學經典具有重要的范式意義，能對人的思想產生特殊的影



響,能對讀者及批評家產生深遠的影響。

因此,中國文學想要在英語世界成為「反經典」進入世界文學體系的中心就需要符合這一時代權威文學機構的認可。在當下以西方文學為主導的世界文學體系中,西方世界編撰的中國文學選集是中國文學作品在西方世界「經典化」的重要途徑之一。這些選集的編選策略體現了西方主流的文學理念及審美旨趣以及西方對中國文學作品的審美期待。

## 二、宇文所安與《諾頓中國文選》的編選

美國當代著名漢學家宇文所安歷時三年編譯的《諾頓中國文選》在西方中國文學研究領域是一部里程碑似的宏偉巨著。英國著名漢學家杜為廉指出:「通過加入諾頓選集的行列,中國英譯文學向前邁進了一大步,中國文學在西方世界以及所有非漢學專業的英語讀者之中也聲譽愈隆。」(Dolby, 1997: 588)這部文選被列入了著名的諾頓(Norton)系列,並成為美國大學中國文學課程的教材。文選出版後得到了學界的一致讚譽。美國著名漢學家史景遷在為此選集寫的書評中盛讚此選集為「一部值得珍藏的佳作」。(Spence, 1996: 42)美籍著名華裔學者歐陽楨稱讚此選集「無論在內容範圍還是文本多樣性方面都超出了以往任何一部選集。」(Owen, 1996: back cover)

大部分文學選集在編選時會採用兩種方法:一是歷時的方法,按照歷史演進的順序羅列出每一時代代表性的文學作品。在羅列文學作品時或根據文類進行分類,或根據作家進行分類。第二種方法以文類為綱。在不同的文類下收錄不同時代不同作家的作品。這兩種編選方法條理清晰,簡潔明瞭,但弊端在於不同時代的代表性文學作品之間的關係是斷裂的,這兩種方法不能展示出文學作品的內在聯繫以及文學在衍進過程中的豐富性和複雜性。宇文所安認為,這也是大多數西方讀者對於中國傳統文學的誤解,他們認為中國傳統文學中有內在的不變的特性。

但宇文所安指出,中國文學史是一個有著連續性,不斷衍化發展的歷史。「儘管文學傳統是一股統一的力量,但它卻遠不是單一一塊。從廣義來看,中國文學作品為他的人民展現了寬廣的人性的可能性。文學能幫助確立、扭曲甚至顛覆社會價值。」(Owen, 1996: xxxix)因此,研究宇文所安在這部文選中對中國文學史的梳理以及遴選作品的標準和策略,可以反映其背後所體現的西方主流的文學觀念以及西方學術型讀者閱讀中國文學作品的審美旨趣。

## 三、《諾頓中國文選》的選目標準與中國文學在英語世界的經典化

朱東潤主編的《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是上世紀六十年代以來中國高校文科「中國古代文學」課的主要教材,也是國內學者學習中國古代文學作品的主要參考書。此書幾經重版,沿用至今,具有重要的影響力,其權威性不容置疑。《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共分上、中、下三編,共六冊。此文選採用歷時的方法,按照歷史演進的順序將每一時代代表性的文學作品按照作家進行歸類。上編自先秦至魏晉南北朝;中編自隋唐至宋;下編自元至近代。所選錄歷代重要作家作品,以思想性和藝術性相統一為標準,同時注意作品題材的廣泛性和風格的多樣性。將《諾頓中國文選》與《中國歷代文學作品選》對中國文學作品的編選進行比較,有助

於把握宇文所安在編選中國文學作品時的標準和視角。這一標準和視角反映了以西方文學為主導的世界文學場域對中國文學的審美期待。

就《詩經》這一部分，朱東潤挑選了共二十五首詩，並且按「風」「雅」「頌」進行歸類。宇文所安共挑選了六十首詩，主要按照「周朝的建立」「人殉與人牲」「理解與誤解」「求愛、婚姻與愛情」等主題進行歸類。將二者挑選的詩歌進行比較發現，兩本文選在選目上存在較大的差異。朱東潤共從「國風」中選擇了十六首詩。但其中的《卷耳》《氓》《伯兮》《伐檀》《蒹葭》《月出》《七月》並未被宇文所安所挑選。朱東潤所挑選的五首「小雅」詩歌只有一首《采薇》被宇文所安收錄。朱東潤和宇文所安均從「周頌」中挑選了兩首詩歌，但兩位編者的挑選標準完全不同。朱東潤選擇的是《噫嘻》和《豐年》，而宇文所安選擇的是《我將》和《芟載》。

《伯兮》和《氓》是兩首愛情詩。《伯兮》描寫的是一位妻子對出征戰場的丈夫的思念。此詩前四句為妻子對丈夫的讚美，丈夫長得威武挺拔而且勇敢。第二部分則筆鋒一轉描述丈夫走後妻子的失落。「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為容？」丈夫走後，妻子就不再打扮自己了，任頭髮凌亂成蓬草。在當時的社會語境中，妻子「洗紅妝」的做法是對丈夫表明自己的忠貞。「願言思伯，甘心首疾」；「願言思伯，使我心痠」；對丈夫的思念由無心梳妝到頭痛再到患心病，在刻畫伉儷情深時，也反映出中國古代婦女的價值觀，那就是家庭為天，丈夫為天，丈夫的離去就代表著女性幸福的崩潰。

《氓》是一首以女主人公為視角的敘事詩。詩的第一、二部分講述的是戀愛的過程。「送子涉淇，至於頓丘，」最初也情意綿綿。第三、四、五章則詳述婚後生活以及感情的破裂。「士也罔極，二三其德」，「言既遂矣，至於暴矣」，丈夫三心二意，甚至對操勞的妻子施暴。最後一章則表達了妻子與丈夫決絕的決心，「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此外，在這首詩中妻子在回憶了自己失敗的婚後總結了如下經驗教訓：「於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她勸告年輕女子不能對丈夫太癡情，這樣會在感情中處於被動，容易受到傷害。

這兩首愛情詩皆是《詩經》中的名篇。然而，宇文所安卻並沒有將他們收錄進《諾頓中國文選》。宇文所安在文選中有關《詩經》的部分提煉了「求愛、婚姻與愛情」這一主題，其中收錄了九首與愛情婚姻有關的詩。值得一提的是，九首中包括極具現代精神的《召男·江有汜》及《鄭風·褰裳》。這兩首詩也是描寫棄婦的詩，但與《氓》所不同的是，這兩首詩的女主人公在被丈夫始亂終棄後，並沒有自怨自艾、懷疑愛情，而是灑脫且曠達。「子不我思，豈無他士？」你若不思念我，天涯何處無芳草！由上可見，宇文所安在對《詩經》中愛情詩進行挑選時，他更青睞具有現代精神，契合現代價值觀念的詩作。

《詩經·小雅》是《詩經》二雅之一，是中國最早的現實主義詩歌，奠定了中國詩歌反映現實的傳統。《小雅》中最為著名的是關於戰爭和勞役的作品以及反映時政世風的作品。朱東潤在「小雅」中挑選了《采薇》《黃鳥》《節南山》《雨無正》《何草不黃》五首。宇文所安挑選了三首：《采薇》《出車》《六月》。

《采薇》是《詩經·小雅》中傳唱度很高的一首。此詩描寫的是一位解甲退役的士兵在返鄉途中對往昔崢嶸歲月的追憶。這首詩也反映了《小雅》的主流。《黃鳥》《節南山》《雨無正》《何草不黃》也是針砭時弊的現實主義詩歌。但這四首詩共同的基調都是憤怒的、悲觀的。《黃鳥》描寫的是流落他鄉的異鄉人所經歷的壓迫和欺凌。《節南山》則是周幽王大夫對執政者尹氏的暴政的控訴，體現了詩人憂國憂民、直言敢諫的精神。《雨無正》的主題也是對周幽王的昏庸殘暴以及朝廷大臣昏聩誤國的抨擊。《何草不黃》描寫的是在外服役的征夫的艱苦生活以及遭受的非人待遇。

而宇文所安所挑選的《出車》和《六月》雖然也是以戰爭為主題，卻是從正面歌頌天子或諸侯的功績。兩首詩的基調是樂觀的、積極的，充滿了強烈的自豪感。《出車》歌詠的是周宣王初年討伐獫狁的勝利。詩中熱情地頌揚了統帥南仲的赫赫戰功，表現了君臣們對建立功勳的自信。《六月》歌頌的則是周宣王時期大臣尹吉甫對獫狁的北伐。尹吉甫深入獫狁腹地，立下赫赫戰功，鞏固了周王朝的統治。此詩便是對他的文韜武略及英雄風範的讚美。由是可見，在挑選現實主義詩歌時，宇文所安更青睞積極正面的，催人奮進的作品。

朱東潤在樂府民歌部分挑選了十四首樂府民歌，包括《戰城南》《有所思》《上邪》《江南》《平陵東》《陌上桑》《東門行》《飲馬長城窟行》《婦病行》《孤兒行》《白頭吟》《十五從軍征》《上山采靡蕪》和《焦仲卿妻（並序）》。其中，《有所思》《上邪》《陌上桑》《白頭吟》《焦仲卿妻（並序）》為愛情詩。《有所思》表現的是一位女子在感情生變後的一系列心理變化。《上邪》是一篇忠貞的愛情誓言。「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也成為千古歌詠忠貞不渝愛情的宣言。《陌上桑》以詼諧幽默的手法刻畫了一位美麗堅貞的採桑女秦羅敷。《白頭吟》是漢代才女卓文君的作品。詩中的「願得一心人，白首不相離」也成為歌詠堅貞愛情的千古名句。《上山采靡蕪》講述的是棄婦和故夫重逢後的場景。《江南》是一首採蓮歌，民歌以簡潔明快的語言，回環往復的節奏，勾勒出了一幅寧靜而又生動的勞動圖景。

其餘七首則是針砭時弊，具有現實意義的詩歌。《戰城南》是為悼念戰場上陣亡的將士而作，全詩基調沉重。漢朝和匈奴之間戰事頻繁，大量的士兵戰死沙場。這首民歌表達了人民對戰爭的憎惡。《十五從軍征》則描寫了一位十五歲從軍，八十歲才解甲歸家的老兵回鄉後發現家敗人亡的故事，從而揭露了當時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對人性的戕害。《平陵東》則通過描寫漢代官吏欺壓平民，使百姓傾家蕩產的惡行，揭露了當時殘酷的社會現實。《東門行》描寫的也是在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下，底層人民為生活所迫不得不拔劍而起落草為寇的故事。《飲馬長城窟行》通過女主人公對遠征的丈夫的思念揭露了在當時的社會，戰爭與動盪所造成的妻離子散、骨肉分離。《病婦行》描寫的是一戶窮苦人家的悲慘遭遇。母親病入膏肓，生命垂危，在臨終之前向丈夫托孤，後通過丈夫買餌、孩子索母兩個細節的描寫將一家人淒婉的生活慘劇刻畫地淋漓盡致。《孤兒行》則通過孤兒的視角，描繪了當時社會人情的冷漠以及道德的淪喪。這七首樂府民歌立意深刻，是樂府民歌中具有代表性的現實主義詩作。

《文心雕龍》開宗明義提出「原道」「征聖」「宗經」的要求，要人效法聖人的經典，向聖人學習。陸機則提出「濟文武於將墜，宣風聲於不泯」，使文學從屬於立言範圍的不朽盛事，提高到治國安邦的地位。韓愈則提出「文以載道」。在中國傳統詩學中，文學最重要的是能經世致用。朱東潤的選目也正好體現了中國傳統詩學觀的影響。

宇文所安在《諾頓中國文選》中共挑選了 33 首樂府民歌。但值得注意的是，宇文所安所選擇的現實主義詩作明顯少於朱東潤。在朱東潤所挑選的十四首民歌中，現實主義作品占了一半的比例。宇文所安也收錄了《平陵東》《戰城南》《東門行》及《飲馬長城窟行》。但他沒有選擇《病婦行》《孤兒行》和《十五從軍征》，但增錄了《雞鳴》和《木蘭辭》。在 33 首樂府民歌中，現實主義詩歌只有六首。宇文所安收錄的樂府詩歌還包括：《飛來雙白鵠》《相逢行》《長安有狹斜行》《子夜歌》《子夜四時歌》《企喻歌》（其一、其四）《琅琊王歌辭》《折楊柳枝歌（三曲）》等。這些民歌大體可分為兩類：一類為愛情詩，一類為展現當時人民生活及精神風貌的作品。

《飛來雙白鵠》是一首愛情詩。這首詩以物喻人，通過講述一隻白鵠在獵人射殺了其伴侶後傷心欲絕，

在空中哀號、盤旋、不忍離去的感人故事，從而隱喻男女之間真摯的愛情以及喪偶之痛。《子夜歌》也是一組愛情詩。《子夜歌》共有四十二首收錄於《樂府詩集》中。這些詩大多為女子對其愛情生活的吟詠，反映了當時女性對幸福的嚮往。《子夜四時歌》同樣是一組歌詠愛情的民歌，現存共七十五首，其中春歌二十首，夏歌二十首，秋歌十八首，冬歌十七首。這組情歌風格各異，有的婉約清麗，有的質樸清新，有的纏綿細膩，有的大膽率真，內容多為女子所訴的相思或哀怨之情。《折楊柳枝歌》是北朝的一首愛情詩，描寫的是年輕女子思嫁的心情以及對愛情的嚮往和追求。「門前一株棗，歲歲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孫兒抱。」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阿婆許嫁女，今年無消息。」這種直白的，毫無遮掩的恨嫁凸顯了北方女子的率真與潑辣。

《相逢行》是漢代樂府相和歌辭的清調曲，是酒宴上為娛樂富豪所作。這首詩借兩個貴族少年街上偶遇後的攀談，對當時社會中的權貴階層所過的奢華生活進行了細緻的描寫，「黃金為君門，白玉為君堂。堂上置樽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雖然這首詩立意並不深刻，但這首詩向我們展示了當時社會中上流階層的真實生活畫面及審美情趣。《長安有狹斜行》和《相逢行》異名同詩。《企喻歌》是一組北朝民歌，本為北方民族的馬上之樂。西元四到六世紀，中國北方大多處在鮮卑、匈奴等少數民族的統治下，先後建立了北魏、北齊、北周等五個政權，史稱「北朝」。北朝民歌大都豪放直率，語言質樸，表現了北方民族的英勇豪邁。《企喻歌》和《琅琊王歌辭》便是裡面的代表。《企喻歌》產生於後燕至北魏之際。當時的中國北方戰亂不斷。因此，當時的時代精神呼喚堅毅勇敢，臨危不懼的勇士出現。《企喻歌》所頌揚的「男兒欲作健」的鮮卑勇士正體現了當時北方民族的民族氣質和人格理想。

通過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朱東潤在挑選作品時更注重作品的社會意義和教化功能，而宇文所安則更為關注「人」這一命題本身，如人的情感，人的生活，人的精神風貌等。

在西方文學史上，以亞裏士多德為代表的文學作品需反映「普遍人性」的文學觀以及塞萬提斯在《堂吉珂德》中所提出的文學作品應反映人生的「鏡子說」是西方對「什麼是文學作品主題之美」的恒定標準之一。宇文所安在《諾頓中國文選》中對中國文學的編選標準正好體現了這一審美標準，這也是中國文學作品通過該文選成為「超經典」進入世界文學體系中心的關鍵所在。

#### 四、結語

中國文學的對外譯介並不是在真空中進行。中國文學要實現有效的對外傳播需要在西方文學擁有絕對話語權的世界文學體系中找到一條能被接受但又不抹殺自我的上升通道。宇文所安在《諾頓中國文選》中的編選策略和標準體現了他對普遍人性、對人的普遍情感以及對存在與死亡等與「人」有關的命題的關注。這一標準體現了以西方為主導的世界文學體系對中國文學在主題上的審美期待。世界文學體系是一個等級森嚴的不平等體系。在這個體系中，西方文學擁有著絕對的話語權，而中國文學則處於邊緣地位。這一現狀在短期內無法改變，要使中國文學在異域成功的經典化從而獲得在域外流通的機會，並最終被西方讀者閱讀從而獲得國際聲譽，我們需要做的不是抵抗式的單邊的送去，也不是對西方文學旨趣及文學樣式的一味迎合。超越中西審美的分野，找到西方對中國文學的審美期待與中國文學審美旨趣的契合點才能實現中國文學在西方的「經典化」。

## 参考文献

- Hawthorn, Jeremy. (1994). *A Glossary of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2<sup>nd</sup> ed. ),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Inc. .
- Lefevere, Andre. (2006). *Translating Literature: Practice and Theory in 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Context*.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 Mona Baker, ed. (2004). *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Owen, Stephen. (1996). *An Anthology of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o 1911*, New York & London: Norton Company, p. xxxix.
- Pearsall, Judy et al. , eds, (2001). *The New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 劉洪濤,尹星編:《世界文學理論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
- 童慶炳,陶東風編:《文學經典的建構、解構和重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 伊塔洛·卡爾維諾(著),黃燦然,李桂蜜(譯):《為什麼讀經典》,南京:譯林出版社2006年版。
- 張隆溪著:《中西文化研究十論》,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Editors: JIANG Qing & Bonnie WANG)